
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

对革命老区村民社会流动的影响^{*1}

——基于大别山红安县“三村”线性分布调查分析

张瑜烨¹， 强月新²

(1.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2.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红色文化是革命老区特有的政治资源之一，红色文化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或资源的传播。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播赋权就是政府、传媒和社会等主体，通过红色文化特有的权力和资源这个外在的推力，去帮助革命老区弱势群体，通过加大社会流动，在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全方位提升，从而改变其生存环境、改善生活状态、提升生活质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流动是关键，而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是前提。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提高了革命老区的知名度，扩大了老区人的人际关系，助推了老区民众的社会参与，加剧了社会流动。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在提高“红色旅游”影响力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并加大了本地社会水平流动量。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对老区社会流动实施影响的理论来自于三个方面：符号理论、“场域”和资源网状效应论。

【关键词】 革命老区；社会流动；红色文化传播；红安县；赋权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 (2016) 06-0146-06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16.06.023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4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50%，中国9亿农民，将有5亿农民离开土地，流动到城镇生活。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革命老区社会流动是老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重点。老区社会

¹ **【收稿日期】** 2016-07-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BXW081

【作者简介】 张瑜烨（1970-），男，河南信阳人，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媒介经济学、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强月新（1964-），男，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实务、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流动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突出问题，需动员全社会资源解决。而红色文化资源是老区最珍贵和最独特的资源，也是当时老区人民进行革命、战胜困难的无价之宝。研究“特色文化资源”服务“老区社会发展”问题具有实践价值。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考察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与老区社会流动关系，并拟通过红色文化社会传播效应研究，反思现有的传媒政策，使其利于解决老区社会发展问题的课题，为媒介服务社会提供一种有借鉴意义的传播理念。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郑杭生教授认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是社会流动典型类型。水平流动是个人或社会价值在变化起点和终点之间位置没有方向上的变化或者说在同一个分层水平位置上横向变动，这种变动并没造成其先前等级位置的变化。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流动，也可称为纵向的变动^[1]。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就业机会加大，其社会流动已成为常态。“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45亿人，26年增长了近73倍，年均增长18%左右”^[2]。有学者把农民社会流动描述为：“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过程使农民逐步从土地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实现农民职业与身份分离”^[3] 65，“农民在城乡之间、异地之间的自由流动，既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权利。无论从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还是从大规模人口的城镇化而言，大多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还需要一个过程”^[4]。本研究的社会流动主要指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老区村民从“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转变的过程”^[5]。

红色文化在中国既是一个政治属性词，也是一个特定文化系统和文化价值的词汇。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红色文化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融合中国特定区域内的多元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6]。蒋志臻提出了“红色经典”传播模式的变迁，指出了新媒介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困境。陶东风认为红色文化深受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影响，并逐渐成一种特殊形态的消费主义后革命文化的畸形繁荣。就红色文化传播研究而言，其主题主要聚焦于：从政治角度需要阐释其宣传产品属性；从经济角度需要阐释其经济产品属性；从传媒角度需要阐释其文化产品属性。这些研究厘清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政治需要、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

近年学界对社会流动与文化研究主要聚焦几方面：（1）陈丰提出动员文化资源为社会流动服务的新理念^[7]。（2）朱冬梅等从流动人口对“语言习俗的适应度”、“对群体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与当地相处及交流度”三方面来反映社会流动对文化认同感所带来的影响^[8]。王蓉认为农村社会流动推动了文化的流动，但同时产生了乡村文化的分化和观念的断层^[9]。（3）马广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草根文化与农村社会流动的关系，认为“农村社会流动可以为农村地区带来新的、进步的意识观念，促进‘草根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中一些不良的思想，会对‘草根文化’造成破坏，影响它原本自然的东西”^[5]。同时也认为“文化的兼容和变化，必然会对社会流动方向造成影响”^[5]。（4）石长慧认为“文化易适应性易同化性对流动在城市的农村青少年渴望留在城市生活起到积极作用”^[10]。这些研究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角度大致厘清了文化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合理的社会流动是解决老区农民贫穷现状问题的主要途径。而被红色文化资源长期侵染的大别山红安革命老区，社会观念及社会变迁深受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动态流转过程展现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之中。独特的社会流动在“符号理论”、“场域理论”、“赋权理论”和“创新与扩散理论”解释下，最终定位于其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积累、赋权与扩散。本文致力于把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放在赋权理论视角下去观照如何利用传播赋权理论去动员公共文化资源，去研究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对革命老区社会流动影响的课题。

二、田野调查开展情况

调查组选择红安县三个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揭示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与革命老区社会流动关

系。经过2015年2-7月大量准备工作，调查小组分别到大别山区全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城关杏花乡郭受九村、高桥镇长丰村开展“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对革命老区社会流动的影响”专项调查活动。调查点选择基于有“有代表性”和“便利性”两个基本要求。本次采用查阅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个人访谈法、座谈会、直接观察法等多种调查方式。

调查组分3小组，每组由两名访员组成，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逐户填答问卷。除去拒访、家里没人等无效问卷情况外，共获得有效问卷1078份，占长胜街、郭受九村、长丰村总人数的54%。问卷内容包括村民家庭经济情况、媒介接触情况、社会流动情况、对本地红色文化了解情况，红色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受众、渠道、内容和传播效果等。调查组还对红安县相关领导进行了访谈，获取了大量间接资料。

家庭年收入是分析红安县居民外出流动重要因素。从总体看，劳动力占被调查总人数68.90%。家庭收入4000元以下比例是13.60%，20000元以上占5.80%。打工经济、林特经济与传统种养业是村民主要家庭收入，其中打工经济占当地村民家庭总收入60%。从调查情况看，2014年长胜街村民人均年纯收入5000元，郭受九村5168元，长丰村5300元。从国家统计局查阅相关数据得知，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892元，红安农村人均纯收入8057元。比较得知，红安县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大多数家庭还处于国家贫困水平。

三、红安县“三村”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现状

据《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赋权即赋予权利和权威。“赋权”一词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针对受歧视的美国非裔黑人增能工作而提出的一个社会学词语。赋权的核心是政府、社会、个人等帮助无权或弱权的个人或者集体获得权力和资源，从而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状态。Rees认为，赋权的目标是通过特殊途径帮助弱势群体或个人获得权力和资源，最终实现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公平与正义。中国学者范斌认为赋权有两大模式，即案主自身主动赋权和外力推动的赋权。主动赋权重在自我唤醒、自我激励和自我能动。外力推动重在通过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与资源等他力去激活调动。同时，范斌还认为，赋权包括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个体层面重点在于个体自身的发展、个体权力感和个体能力的提升；人际关系层面重点在于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层面的提升；社会参与层面重点在于通过社会策略和技巧，组织有序合理的集体行动，争取社会权力和资源，改善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政策。

红色文化是革命老区特有的最大政治资源之一，红色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符号或资源的传播。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传播赋权就是政府、传媒和社会等主体，通过红色文化特有的权力和资源这个外在的推力，去帮助革命老区弱势群体，通过加大社会流动，在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全方位提升，从而改变其生存环境、改善生活状态、提升生活质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流动是关键，而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赋权是前提。

（一）村民对红色文化信息接触程度的频数

通过考察村民接触红色文化信息便利程度的频数和是否主动关注红色文化信息的频数，我们了解村民对红色文化信息接触的程度。

(表 1)	村民接触红色文化信息便利程度的频数分析			(有效样本 1078 份)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便利	289	17.2%	17.2%	17.2%
较便利	658	39.2%	39.2%	56.4%
便利	426	25.4%	25.4%	81.8%
不便利	165	9.8%	9.8%	91.6%
根本接触不到	140	8.3%	8.3%	100.0%
总计	1678	100.0%	100.0%	

(表 2)	村民主动关注红色文化信息的频数分析			(有效样本 1078 份)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主动	253	15.1%	15.1%	15.1%
主动	821	48.9%	48.9%	64.0%
偶尔主动	286	17.0%	17.0%	81.0%
不主动	172	10.2%	10.2%	91.2%
根本不愿接触	148	8.8%	8.8%	100.0%
总计	1680	100.0%	100.0%	

从表 1 和表 2 看出，近年红色文化建设、宣传和传承中，革命老区非常注重红色文化“落地”问题，村民接触学习红色文化机会较多，红色文化已成为老区村民生活中重要部分。日常生活中老区大部分村民还是能积极主动关注红色文化信息，也能方便地接触到红色文化信息，村民对红色文化信息接触的程度较高。

(二) 村民对红色文化传播中权威的传播者认可情况

传播渠道是承载和了解老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传播渠道。革命老区的大众传播主要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及电脑和手机等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群体传播主要指村民中的族群、亲属群、朋友群和熟人群等传统成员间信息交流与传播；人际传播主要指老区村民之间面对面的一种信息沟通与传播；组织传播主要指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红色旅游企业、其他企业和相关社团组织等的信息交流与传播。

通过对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分析，老区村民大致知道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了解红色文化。由于老区大众传媒的不发达，特别是传统媒体某些方面缺位，老区村民还是最认可组织传播，尤其信任政府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对旅游传播也有一定的兴趣。在大众传播渠道，村民最愿意通过电视媒体去了解红色文化，手机和网络成为村民了解红色文化的新媒介方式。在群体传播渠道，村民也尝试着在族群、亲属群、朋友群和熟人群中去了解红色文化。在人际传播中，村民最信赖村里的能人，包括德高望重的村民，在经济或读书、做官等方面的成功人士，以及红二代或红三代等。

(表 3) 村民对红色文化传播中权威的传播者认可情况		(有效样本 1078 份)		
红色文化传播中 权威传播者		所选次数	应答次数百分比	应答人数百分比
	新闻媒体	852	21.4%	79%
	政府部门	986	24.8%	91.5%
	旅游企业	509	12.8%	47.2%
	村委会	457	11.5%	42.4%
	社会团体	286	7.2%	26.5%
	村里能人	568	14.3%	52.7%
	族群、亲属群、朋友群	326	8.2%	30.2%
	总计	3984	100.0%	369.5%

四、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对红安县社会流动的分析

建国至今，红安县社会流动经历了沉寂-复苏-活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多因素促使这种流变发生，包括国家制度、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大众传媒等。相对而言，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是促使红安县社会流动加剧的新生力量。学者余秀兰在研究文化再生产理论时强调“我国已经形成了两个封闭的循环圈：城市优势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11] 223}。中国古代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教育对于社会流动作用的最好佐证。

第一，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提高了红安县政治层面的知名度，扩大了红安人的人际关系，助推了红安民众的社会参与，加剧了社会流动。其传播有四种主要方式：其一，通过权威媒体对红安县红色文化进行专题报道，用“重型式”新闻体裁加大报道深度和力度。如《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其二，通过影视剧作品聚焦红安“革命精英”，用“特殊式”影视镜头着力提炼宣传红安人的革命情怀，使“红安精神”成为一种经济建设中的“示范”。截止目前为止，以红安县人物为原型拍摄的影视剧作品多达8部。电影《沙家浜》郭建光人物原型来自于刘飞中将（红安籍），电视剧《亮剑》李云龙人物原型源于王近山中将（红安人）等。其中，电视剧《亮剑》重播次数多达104次。随着影视剧作品的广泛传播，红安县“红色传奇”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其三，通过对特殊节日、纪念活动的“纵深”报道，宣传红安县革命精神。例如，2007年红安县举办了纪念黄麻起义80周年活动，全国近50家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红安县及“红色文化”在此期间得到扩大化传播。

第二，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传播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增强流动主观意愿。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进入红安县后，红安县居民思想观念起了很大变化。正如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所说，“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会逐步地影响人们，使他们更加现代。在大多数地方，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能；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12] 76}。红色文化的传播给村民既带来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冲击，增强了文化的自信，也带来了吸收外来文化的意愿，文化的进出改变了村民思想观念，增强流动主观意愿。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到流动洪流中。这种流动主要包括两种：外出打工和求学。其中，求学流动的比例越来越小，以“农民工”身份构成的外出打工洪流般的流动越来越大，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传播成为其流动的新生力量。

第三，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在提高“红色旅游”影响力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并加大了本地社会水平流动量。现代社会，囿于时间和空间范围限制，大众媒介成为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对旅游地形象的传播，大众媒介充当了中介和桥梁作用。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认为，大众媒介通过把握新闻报道的选择权、优先度以及表达形式对社会环境进行再构建，在公众周围创造一种舆论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观念^{[13] 133}。红安县尽管出了两百多名将军，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县”，但外人知之甚少。随着广播、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针对与红安相关的红色文

化报道力度加大，红安县名声鹊起，在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红安县成为全国红色文化流动的主要区域。可见，大众传播在提高红安县知名度上起着核心作用，并加大了本区域社会水平流动量。

五、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对老区社会流动实施影响的理论观照

为了准确把握红色文化传播对老区社会流动实施的影响，本课题组对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进行了分析，发现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对老区社会流动实施影响的理论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符号”的力量

皮埃尔·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作为一种权力实践符号既是意义与沟通工具，更是权力技术工具。“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符号和符号体系作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它是被塑造结构的，也有塑造结构的权力”^{[14] 166~167}。符号权力理论体现的是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包括官方话语符号体系生产。布迪厄提出符号塑造社会现实是一种真正政治功能，“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好工具，它们促成了一种对社会意义的共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14] 167}。

据符号学理论，作为全国“第一将军县”的革命老区红安县，其红色符号及相关的红色符号体系，是以红色文化符号资本为基础，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时红色文化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一种集体习惯和约定俗成，是符号与特定意义联系之间的“共识”。这种建立在红色文化符号资本上的“共识”，也是处于符号权力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目的生产场域与社会阶层的场域所建构的一种“误识”。对红色文化资本的“误识”是政治权力对红色文化资本的一种强化的认同，一种被“神化”的力量。据此，红色文化资本变成了符号资本，即一种信誉资本。拥有这种特殊符号资本的强势群体，如政府、利益集团和相关组织，会把对社会符号建构强加给弱势群体，其强势力量就是符号权力，也是一种符号暴力，并且这种符号权力能够促使弱势群体就社会主流问题达成共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再造和维系，从而使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支配关系合法化，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红色文化资本的信誉、尊重来自于红色文化与其它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社会威望。符号斗争在革命老区这个特定场域中形成了以红色为主调的生存环境，并进入个人的感知系统，在潜移默化作用下，场域的社会流动者逐渐习惯和接受了场域统治者认可的等级资本分配结构，并赋予信誉和尊重的意义，同时也形成了对革命老区特殊场域内环境的“幻象”和“误识”。这种由社会个体到社会集体的“误识”行为的符号权力弥漫整个社会空间。通过红色文化特有的符号培养和驯服，社会流动者对既有的生活规制和社会秩序的尊重，制造一种区隔感。流动者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等习惯系统又成为社会流动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总之，在由处于革命老区场域的支配者不断生产的红色文化符号体系中，社会各区域的流动者对社会秩序形成了共同的“误识”，在流动人群的“习惯”作用下，“误识”又进入了流动者的精神世界，成为流动者内在的感知世界，并成为社会流动者“流动”的驱动力。

（二）“场域”间的角逐

布迪厄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场域”理论。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5] 134}。这里的小世界是指某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场域”。同时，布迪厄认为，“场”是一个动态的空间关系，是各种社会力量，运营和竞争的地方。“场域”的源动力来自于“场域”内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分布。场域内的动态变化与平衡稳定来自于各方力量在场域内的位置，位于控制位置的群体会采取保守策略维持“场域”现状，位于被控制位置的群体会采取颠覆性策略改变“场域”现状。

布氏认为媒介场作为一种特殊“场域”而存在，更易受到外部力量渗透，极大影响其他专业场平衡。特别是电视媒体、网

络媒体的出现，加速了媒介场的形成，它们迅速构建的“媒介真实”，深刻影响场域内每个个体认知。据调查，红安县对外界的了解60%来自于各种媒介所构建的“媒介真实”。在革命老区红安这个特殊的“场域”内，最富裕的资本就是“红色文化资本”，即“符号资本”。在革命老区红安县这个“场域”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政府及相关组织，他们拥有对红色文化这个被符号化了的“符号资本”的绝对处置权、宣传权和利用权。红色文化资本成为场域内行动者采取保守策略维持“场域”现状的工具。因此，在政府及相关企业、财团的策划下，围绕红色文化举办的相关活动，如红色旅游、红色节日庆典、集会，包括政府组织的外出打工等流动方式深受场域内民众喜爱。加上媒介场对场域外构建的“媒介真实”，刺激和拉动了“场域内”向“场域外”流动。总之，“场域”成为革命老区的一大磁场，红色文化成为磁场中的一极，“场域”内外平衡与流动的力量来自于红色文化磁力的大小，即红色文化在场域内外的影响越大，围绕“场域”流动的频率越大。

（三）资源的网状效应

在革命老区，信息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是村民流动的重要资源，而革命老区社会关系资源主要体现在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村民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寻求信息、并结成信息网络，再在新的信息网络中寻求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尊重和价值认同，最后又构造新的强社会关系网。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成为村民社会流动主要机制，在这些关系编织中，也刺激了村民社会流动。

从流动范围和频率看，近几年红安县社会水平流动呈加速态势。红安县居民从1999 年开始出现外出打工，并逐年增多，2005 年开始呈现打工高潮，2015 年打工热度持续高涨。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信息流动”的拉动效应及红安“精英群体”等社会关系网络引导的一种结果。大众传媒传播信息所带来的信息流动对村民社会流动的拉动作用处于一般水平，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中心编织的强社会关系网对老区村民的流动作用较大。总体看来，红安县的流动并不是集中于单一的流动方式，而是形成了信息网络、关系网络与流动网络相互胶着的立体流动体系。

六、结论

在当前立体传播体系下，要想红色文化政治赋权传播对革命老区的社会流动起到能动作用，必须做到这样几点：其一，在受众层面，红色文化传播应该让老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关注红色文化信息；在红色文化建设、宣传和传承过程中，政府、传媒等部门应该注重红色文化的“落地”问题，增加村民接触和学习红色文化的机会，加深村民对红色文化核心内容的了解，使红色文化自觉成为老区村民生活中重要部分。其二，在传播渠道方面，要依据老区文化传统、老区传播网络、老区信息资源与社会关系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合适高效的传播渠道。其三，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传播对红安县社会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传播改变了村民思想观念，增强流动主观意愿；二是，大众传媒的红色文化传播在提高老区知名度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并加大了本地社会水平流动量。其四，在传播效果层面，红色文化资本成为影响村民职业选择与流动的外在动力；红色文化传播让老区村民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树立了流动的自信，成为流动的内在推力；红色文化已成为老区村民职业选择与流动的一种优势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其五，红色文化传播主要通过红色文化“符号”力量、“场域”间的角逐和老区社会资源的网状效应等方式对老区社会流动行为实施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甫勤. 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J]. 兰州学刊, 2008, (8).
- [2] 金三林, 王宾, 许召元. 新时期农民工总体特征及发展趋势[J]. 开放导报, 2011, (4).
- [3] 谢咏才, 李红艳. 中国乡村传播学[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
- [4] 罗峰. 流动中的农民异质化及其社会治理[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
- [5] 马广宁. 农村社会流动与“草根文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J]. 法制与社会, 2008, (2).
- [6] 江峰. 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系统要素透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5).
- [7] 陈丰.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2, (6).
- [8] 朱冬梅, 张丹, 等. 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与社会适应性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4).
- [9] 王蓉. 社会流动中的文化分化与观念断层——乡村青年群体的比较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7).
- [10] 石长慧. 文化适应与社会排斥——流动少年的城市融入研究[J]. 青年研究, 2012, (4).
- [11] 余秀兰. 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分析[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12]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 顾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13]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4] 皮埃尔·布迪厄. 论符号权力[M]//吴飞. 学术思想评论.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 [15]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